

中西学术之间的通与塞

受访人——冯胜利

采访人——牛江河



冯胜利教授

内容，比如古气候、地理和地质地貌等等。让不同学科的人一起参加工作需要个人魅力，但最重要的是学生要对多学科合作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而且要知道应该找谁去合作。

郭物：您培养了很多研究生，同时很多学者也曾短期或者长期受教于您，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

奥菲尔：学习了解新技术、新方法和新问题非常重要。中国的考古学家走出国门，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益的是，他们可以带回新的技术。另外学生有机会也应当到国外去学习。

郭物：我记得我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时候，学习旧石器考古专业的人很少，即使是现在，在中国学习和从事旧石器考古的人也很少，您觉得原因何在？

奥菲尔：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1960年到1970年，以色列研究旧石器的人大约只有3~4个。今天您参加以色列考古学家的会议，你会碰到60~70个研究旧石器时代的专家，他们还在训练更多的考古学家。不幸的是，由于经济原因，他们中的很多人找不到工作，他们不得不转向其他的工作。在我的生命中，我可以在中国看到同样的变化。如果你培养更多的学生，他们当中会有更多的学生对旧石器时代考古感兴趣。有非常多有趣的问题等待他们去解答，比如东亚、中亚和西亚的区别。中国旧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结果对西方已有的很多认识将是个挑战，因此交流非常重要。如果你要问我的观点，我建议出版物应当是双语的，在使用中文的同时使用英文。法国面对同样的问题，他们过去也只用法文发表，但现在法文出版物会有一个较长的英文摘要。

另外一个东西中国应当有，就是考古协会。所有的考古学家和研究生都能成为会员，通过这个协会组织大量的讨论。这种好的交流不但要在考古学家之间进行，也要在那些参与考古工作的科学家之间进行。

郭物：好的，非常感谢您！欢迎您继续到中国工作！祝您永远年轻！

冯胜利，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先在历史系攻读古史，两年后又考入中文系陆宗达教授门下读研究生，文史兼治。毕业后留校任教，很快即留学美国，受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拉波夫教授，专攻西方语言学，并获得语言学博士学位。曾为美国堪萨斯大学东亚系终身教授；现为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中文部主任，哈佛北京书院主任，北京语言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曾任国际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语言学论丛》副主编，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项目申请评审人；现为近10种国内外语言学及语言教学杂志编委，以及国内外语言学杂志和出版社审稿人。

冯胜利教授的专业研究领域为训诂学 (Exegesis)、历史句法学 (Historical Syntax)、韵律构词学 (Prosodic Morphology)、韵律句法学 (Prosodic Syntax) 等。他把韵律构词学理论引入汉语合成词的研究，创建了“韵律句法学”的理论，将韵律句法与词法的研究引入对外汉语教学，为基于汉语语言事实和特点而进行的语言理论研究领域作出重大贡献。

著作有《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汉语韵律句法学》等。

主编手记

2009年3月，哈佛大学心理系的博士后牛江河采访了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中文部主任、哈佛北京书院主任冯胜利教授。冯胜利在访谈中以图表等多种方式详尽地阐述了中西学术研究之道。

牛江河：冯教授，第一次听您的演讲时，就对您提到的有关中西学术的精辟见解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很高兴今天又可以进一步请教。

冯胜利：那些都是个人的体会，不一定对。

牛江河：上次您说中西学术是不同的。不同的根本在哪里呢？

冯胜利：从学理上看，根本的不同可以用这张图来表示（见图1）。在我们中国传统学者的脑子里，一般没有这张图，或者说，没有这幅图的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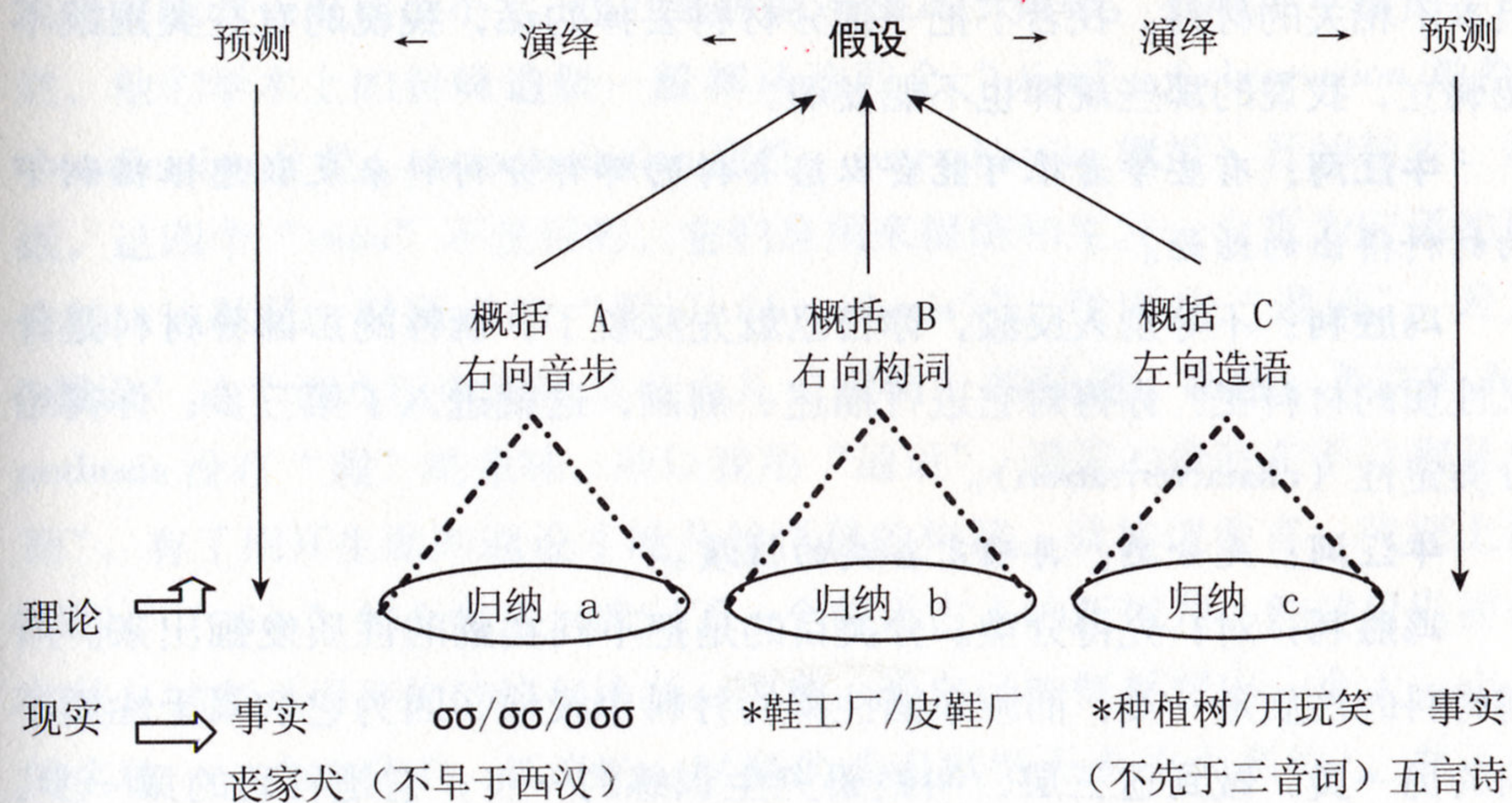


图1 逻辑（“归纳演绎”图解表）

牛江河：这张图的意思是……

冯胜利：这是我总结的做学问的一个简单路数：既可以是学术训练的方法，也可以看做学术构建的模式。学问是怎么做出来的？千里之行，始于现象，从现象一、现象二、现象三等等开始。这就是所谓的观察现象。做学问的第一步就是观察 (observation)。下一步是分类 (classification)。要找出两种现象的可比性，会不会比较就是会不会分类。一进入分类就牵

涉到概念。拿什么来分类呢？比如图中的现实层面上的“*鞋工厂”、“皮鞋厂”、“*种植树”、“开玩笑”这些现象，有的上口，有的拗口。拿什么来区分“上口和拗口”这两类呢？拿意思分，还是拿结构分？拿句法结构分，还是拿韵律结构分呢？如果用韵律结构来分类，你就能往“构学”的上一层走；如果只拿意思分，就卡住了——只能停在这个现实的层面上，在低层表面上打转转。事实上，我们可能停在这里已经很久了，未能突破。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把意思作为分类的标准，无规律可言。而我们在现实中没发现对象规律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在观察的时候没有采取多种分类的方法。不会分类的一个原因，得反过来看，是没有穿透现实往图形上部跨越的“构架式逻辑思维”的方式；而跨不上去的一个原因是你没有把不相关的现象扔掉。

牛江河：您的意思是把一部分材料“牺牲”掉？

冯胜利：牺牲的材料是和你眼下的研究无关的，是和本题纠缠在一起但本不相关的材料。我若不把一部分材料丢掉的话，我说的有些类别就不能确立，我说的那些规律也不能发现。

牛江河：有些学者很可能会以您丢掉的那部分材料来反驳您根据剩下的材料得出的结论。

冯胜利：不等别人反驳，你自己就先反驳了。牺牲的那部分材料是什么性质的材料呢？你得对它进行描述、刻画，这就进入了第三步：你得给分类定性（characterization）。

牛江河：先分类，再确定各类的性质。

冯胜利：对！先得分类。分类目的是把不同类别的性质发掘出来。所需材料的性质是一类，而原来牺牲掉的材料也没错，因为它们属于性质不同的另一类。做到这三层，叫做研究生训练的一步，它是科研的第一步。当然，真正的学术研究的境界，比这要高，因此还要往上攀。注意啊，传统的很多研究就到此为止了，很多学者也到此为止了。西方人觉得你的研究够不上科学的道理就在这儿，因为你的学理境界不高、不深。因为你没往上走啊！再往上是什么呢？叫做概括，即 generalization。这个词儿我们都知道，但“知道”不等于“会”——不是人人都会概括。概括的要求是什么呢？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把某类现象的性质变成一条规则、把你分类的结果和归纳的性质变成一种规律性的东西。譬如，上面例子中“*种植树”、“开玩笑”这类现象的规则是什么呢？我把它们概括成：“凡是动

词+宾语的结构，都是后重而不能前重。”这条规则既包含韵律上的结构（轻重），也包含句法上的结构（动宾）。有了这种系统的概括以后，便可以进入更高的层次，使之成为一种学理，甚至一个学科了。比如事实 b，凡是名词+名词的，都不能是右重（“鞋工厂”拗口），必须是左重（“皮鞋厂”可以说）。再看事实 a，它是纯语音的现象： $\sigma\sigma/\sigma\sigma/\sigma\sigma\sigma$ （嗒嗒/嗒嗒/嗒嗒嗒； σ 代表音节）。这种节奏是没有语义和语法干扰的纯韵律现象，是最自然的音节组合。音节组合的单位叫“音步”，所以“嗒嗒/嗒嗒/嗒嗒嗒”代表了汉语的“自然音步”。这些自然音步，不能是右重（比如，说 5/55/55 很拗口），而必须是左重（55/55/555 才顺口）。上面“动+宾，右重”、“名+名，左重”和“自然音步，左重”都是概括。

有了准确的概括和精密的规律，就可以达到国内学界的前沿，甚至占据国内领先的地位。然而，仅仅概括还不足以达到国际学术最高峰。注意：我们的研究很多都是前沿性的，但是前沿不等于最高峰。只有登上最高峰才能“一览众山小”。西方学者绝不满足于概括，不满足于前沿。当然，他们学术上的登峰造极一般从这四个“-tion”（observation 观察，classification 分类，characterization 定性，generalization 概括）开始起步；然而，这四个“-tion”不是目的，它们是用来提炼和生发一个更为宏通的理念的，这就是一般所说的“假设（hypothesis）”。我叫它“通设”，因为“假设”这个词儿在中文里总有点儿“虚假”的味道。注意：英文的 hypothesis 没有“假”的意味，所以我用“通设”。通设的价值在于“别开生面”。有了别开生面的通设才能开始学科的构建。就韵律而言，我把上面那四个“-tion”结合起来，辟出了一个前无古人的新视角：韵律可以控制句法。这就是后来的韵律句法学。注意：给自己的概括想出一个大一点儿的名称（一个响亮的、新奇的、时髦的或者概括无余的大名称），并不等于建立学科。通设当然也是概括（概括的概括），但是仅仅概括并不足以建立学科。其实，发掘通设的目的并不在于将天下万物涵盖无余，而是要建立严密的科学学术体系。通设的目的在于演绎，演绎的方式是预测，预测的要求是证伪，证伪的一种副产品是一批批地显现出从未发现的新现象和新事实。具体来说，我在作出韵律制约句法的通设以后，通过多项、多层的演绎推理，发现了一大批汉语研究中从未发现的新现象。譬如，古汉语中带施事的被字句如“被尚书召问”必然在“被杀戮”这样的三音节被字句以后才能出现。在现代汉语中，单音节动词带上两个音节的宾语以

后，如“负+责任”，就不能再带宾语了。譬如，“*负责任工作”不能说（只有双音节的动宾可以再带宾语，如“负责工作”）。此外，其他新的概念像“最小词”、“核心重音”等等也在通设的促发下应运而生。这种治学模式和传统的不同是：治学的最高境界不只是通过现象发现规律，更重要的是通过规律揭发新的现象、发现新的世界、构创新的认识。因为通设的目的是演绎，演绎的方式是预测，预测的结果必然回到现实，这样不仅新现象可以层出不穷，该学科也可以因此而不断深化和拓展，从一个学科的开拓发展到邻近学科的创立，从而加深我们对对象的了解，增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拿我研究的韵律构词学和韵律句法学来说，最近我准备把它们扩展成这样（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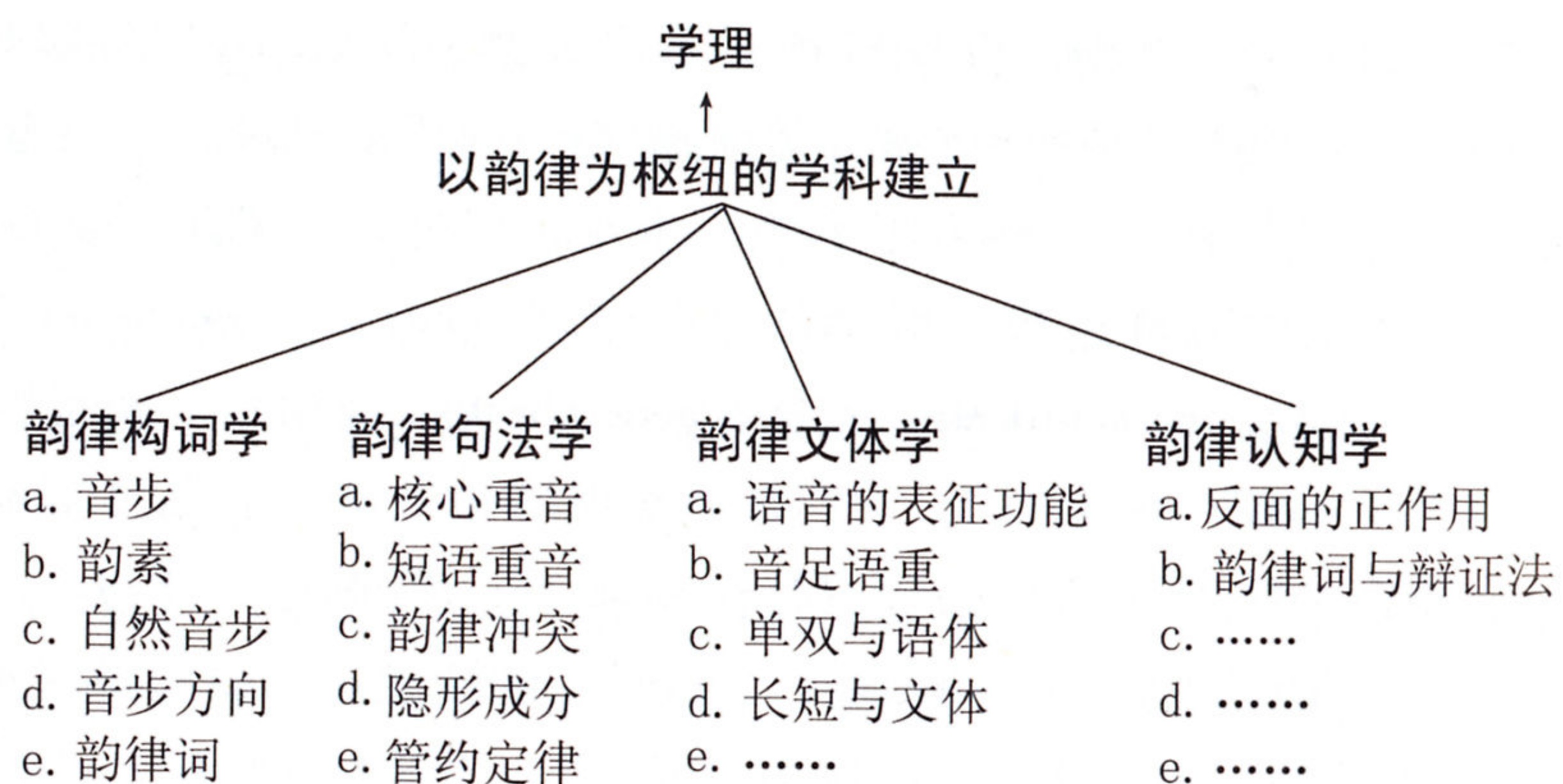


图2 以韵律为枢纽的学科扩展图

这是一个以韵律为经脉，包括韵律构词学、韵律句法学、韵律文体学和韵律认知学的学科系统。

牛江河：很多学科，韵律、构词、句法、文体和认知在您的研究中交叉在一起，换句话说，您的研究是一门交叉学科。

冯胜利：我正在努力。很多现象的本质通过交叉学科的研究才能发现，很多专科的理论通过交叉才能适用。

牛江河：您描述了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建立过程：观察现象，分类，找出它的性质，寻找本质，然后就是概括，概括出一般的规律，提出假设。

冯胜利：现在就到顶上了，但没完。看到演绎了吗（见图1）？做学问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归纳法，就是找材料，就是傅斯年所谓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罗振玉收集甲骨文也是在找材料。而另一种方法是演绎，譬如章黄之学，靠传世文献《十三经》做出前无古人的学问，这要靠功力、靠演绎才能有所“发明”。季刚把“用原有材料做学问”叫做“发明”，把用新材料做学问叫做“发现”。你的理论告诉你，必然有一种你以前从来没想到过、不知道的现象，这叫演绎。你的理论告诉你，某种现象绝对会有，某种现象绝对不会有，这也叫演绎。演绎是用绝对的方法找出相对的事实。中国传统学术从情感上说是反绝对的，因此和演绎保持很大的距离。

牛江河：“发明”是靠别人都熟悉、但不知道其“奥秘和规律”的材料说话，这需要更深厚的功力和更有力的逻辑。您的韵律体系就是在众人都知道的语言材料上，挖掘出来的以韵律主线贯穿的“奥秘和规律”。

冯胜利：是的。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梅祖麟老师就告诉我：这个题目早就有人想过，但你别碰它，做不出来的。

牛江河：做学问时，也不能一上来就演绎吧？

冯胜利：是的，演绎是“高峰”上的事。只有到了假设理论的学科高度，才能演绎。国人有时不善演绎是因为没有达到这个高度，那当然不会去想演绎啦。

牛江河：图里演绎的后面是预测。

冯胜利：对！什么是一个系统？什么是一个理论？除了你观察到的现象以外，你还能预测别的现象吗？譬如，这方面的现象一定没有，那方面的情况一定没有，等等。我在韵律理论上的一个预测是：远古汉语一定是单音节音步的语言。你的理论能不能预测是第一步，你能不能证明你的预测是第二步。有些证明的方法和材料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找到。我用了多年的工夫才找到了有限的几条证据，说明上古音步的确如此。注意：你必须要有逻辑的思维，才能把现象变成证据。否则的话，对于那些知道的，甚至非常熟悉的现象，你也会熟视无睹，不能把它们引为证据。譬如，人类祖先都知道潮涨潮落，但从来不会把它当作地球有吸引力的证据。远古汉语单音节音步的证据是我们熟知的远古二言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天下没有一个音步的诗行。如果远古确有二言诗，那么它必然一言一个音步，非如此不是二言诗。“远古存在二言诗”是事实，因此单音节音步的存在也必定无疑。我从来没想到过，小时习以为常的“二言诗”，

后来却成了我铁鞋无觅、回首蓦得的音步证据。

牛江河：您的理论还能预测什么？

冯胜利：我的理论告诉我如果动词+宾语已经三个音节了（如“负责任”），它就绝对不能再带宾语了。这个现象是理论告诉我的，我不知道行不行。最后找了半天，都是这样。至今找不出一个反例。动词的两个音节必须是标准韵律词，才能带后面的东西（负责——负责财务）。如它本身不是一个韵律词，不是一个词了，成了一个短语了（负责任），那它后面不可能再跟别的东西了。我可以预测一，预测二，预测三，我可以永远预测下去。看你的逻辑能力能够推展到哪儿。这不是看你知道多少东西，这是看你能够把逻辑的能力往哪个方向推。推完之后，再回到现实中来验证。

牛江河：西方语言学里已经有韵律词的概念了。

冯胜利：不错，韵律词这个概念西方已经有了，叫 prosodic word。但我把它用于中文，给以定义、提出限定、改拓性质，将它纳入中文的系统。

牛江河：您作的韵律构词、句法的研究看来也是东方学术和西方学术的交合，属于交叉学术。如果您当年没有出国，在国内一直教书，没有接触到西方的学问和学术方法，那您能有今天的学问吗？

冯胜利：不大可能，不大可能。因为第一，在过去的学术体系里，只能做到我们前面说的概括。做到这一层，就完了。我不可能往上走，没必要往上走，也不会往上走，我已经到头了。就像尽管现在很多人想建立学科，但只在这个基础（概括）上建立学科，因此很难构建一个真正的、能证明和证伪的学科逻辑体系。若不到西方的话，我们没有与之交合的东西，缺乏能够让学理站得住脚的逻辑体系和办法，即使我可能找到一些韵律句法的表面现象，也不可能找到像“*负责任工作”这样不合语法的现象。事实上，国内也有人对韵律句法学这个学科有兴趣，但没有用这种方法，因此很难找出别开生面的新现象。为什么呢？很简单，这种现象不是找到的，而是推出来的，是理论告诉你的。这就是说，理论具有探照灯式的功能，它告诉你往哪边走、什么地方有“宝”。于是我就按照它的示意去找，一看，真有。这也反过来说明“通设”的理论是对的。

牛江河：您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和您的学科建立有怎样的关联？我对此有些好奇。



冯胜利和他的语音诊所

冯胜利：这么说吧，我是吃了亏才回头的。用传统训诂学的方法来学当代语言学，开始有点格格不入。最初我和导师谈我的想法时，他总说：什么道理让你这么说？这个问题这么做的原则是什么？那样运作的条件是什么？你考虑这个没有？你考虑那个没有？我心想：你还让不让我说话了？我想解释给他听，可是他还是不满意，说：“不要浪费我的时间。”气得我不说了。然而，当我稍稍入门以后，他给了我很多的鼓励，让我把文章投出去发表。渐渐地，我开始上路了，再加上持续关注一些西方人讨论学问的学问、科学的科学，我就慢慢总结出那个图形中所展示的系统来。根据这个图中的构学理论，我可以不问老师，我自己动手构建汉语韵律构词学和韵律句法学这两个学科。20年以前，我只是那么一点儿想法。我现在做的是韵律文体学，准备用两到三年时间把它的理论框架搭起来。在动手构建这个学科的过程中，我利用业余时间搜集韵律认知学的材料，也许三五年，也许五六年，等那方面的材料都搜集得差不多了，我就可以着手考虑韵律认知学的问题了。

牛江河：那现在您能否预测一下您的理论、您的这门学问在中国和在西方的反响如何？有没有什么区别？

冯胜利：好，这问题很有意思，反响很不一样。

牛江河：有什么不一样？

冯胜利：我的韵律句法学在国内反响比较大。因为它是根据汉语的特

点，用西方的方法搞出来的。我不是按照西方的热点和话题，根据他们研究的对象搞出来的。因此呢，我搞出来的东西在西方不受重视。

牛江河：他们懂不懂啊？

冯胜利：这是新的学科，他们还没这个东西，没有兴趣或者没有条件（汉语这个条件）来研究这个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是以西方的方法为工具，根据汉语自身的特点得出来的。西方的语言没有或者很少有这些韵律的特征，所以他们一时看不到韵律的句法作用。就像西方的语言有曲折形式（如-ing, -s等）但我们没有一样。因此他们的曲折理论对我们来说有距离；而我做出来的韵律规则，对汉语很适合，对英文则比较遥远。因此研究印欧语的人也不在意。韵律句法学什么时候能在西方产生作用，我不知道。等它再进一步完善，或许是下一代人的事了。

牛江河：研究文学的理论当中想必有语言学理论吧？

冯胜利：现在很少有用当代语言学理论、尤其是当代形式句法理论研究文学的。原因很简单，当代语言学已经越来越接近数学，和文学距离越来越远。它越来越专业化、技术化。

牛江河：还有统计化。

冯胜利：我对统计有一点儿看法。统计的本质是概括，而不是演绎。当代形式句法学用的都是数理逻辑的推演和公式。学文科的、尤其是从事文史研究的人，很少有这种基础，因此他们对当代形式语言学很反感，而且不接受，所以当代语言学的成果很难和文学结合。

牛江河：那您是怎么结合的？由什么而结合的？

冯胜利：我本人对文学非常感兴趣，因为我是从文史过来的。最早喜欢古代文学，后来学历史。19岁跟陆颖明学《说文》，那时候我最喜欢的还是文学，古诗什么的。出国后，又学了十几年的洋学问：形式句法学、社会语言学等等。所以呢，这两方面我都有一定的体会。用我学到的现代语言学的理论看中国古代的文体学，我觉得里面有很多规律性的东西，一碰就出来了。文学史上很多文体现象都和当时的语言有直接关系。可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人没有从这个角度看。研究语言的人呢，也不管文学。在过去十几年韵律构词、句法的研究里，我不断地体味到，文体上诗、文、词、曲的发展和语言的韵律演变及句法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牛江河：从您的个人经历来看，如果要做学问的话，那么一定要先在国内学文史哲什么的，而不是英语，对吗？

冯胜利：当然了！不然你出来后哪有时间打国学基础？《十三经》、《二十四史》怎么读啊？

牛江河：您的知识结构成就了您的今天，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啊！

冯胜利：一个人总有自己独特的角度，因为你的知识结构跟别人的不一样嘛。你个人的兴趣爱好和别人的不一样，你个人的经历和别人的也不一样，因此，如果你掌握好你个人的独特角度之后，一定能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学问来。

牛江河：这听起来能给那些既有自己独特的经历、角度，又希望做出独特学问的人以极大的鼓舞。我对那些在其他学科里的、可比照您的论说的例子比较感兴趣。这样的例子有吗？

冯胜利：给你举个例子呵。陈寅恪的一个很大贡献就是通过具体而微小的例子来说明历史大事的。

牛江河：以小见大？

冯胜利：“以小见大”说的是表面现象。说他以小见大，其实是贬低了他的学术境界。我觉得他的研究跟马克思一样，是高屋建瓴。马克思认为经济决定历史；他持不同的见解，认为亲缘文化决定历史。他把文化决定历史当作“通设”（hypothesis），由此构建了一套自己独特的历史学说。正因如此，他能够把隋唐以来的一些社会发展的大事件落实到具体的人事和时地上。比如把武则天的派别之争、大臣们的派别之争落实到他们之间的血缘和亲缘关系上。他的研究相当细。能够把历史研究得这么精细，这是一种大师级的功夫。但人们没有注意到，他是把学说当作探照灯去照、去探求历史上的证据的，因此他才能找到别人不曾注意的、小的东西。可见他不是“以小见大”，而是“以大测小”。

牛江河：做大学问不容易啊！

冯胜利：你要首先知道你在自己领域里所要观察的东西。如果你都不知道自己要观察什么的话，你就没法做学问。你观察都观察不出来，怎么能够去分类呢？我对我的研究生说，首先给你半年时间去找现象。你现象找不着，还做什么学问？

牛江河：这种现象或东西、信息是前人没有解释过的。

冯胜利：找别人没有观察、没有关注过的。没关注过的肯定是没有解释过的。这个现象是前人没有关注过的、和以前的关注不大一样的，你的理解就会不一样了。要找这种现象。



冯胜利在演讲

牛江河：很多学者会对别人已关注过的现象给予不同的、新的解释。

冯胜利：对人家都关注半天了的现象给予新的解释，这种做法最没劲，我最不喜欢。你得找一种新现象。你不接触和不揭示一批新现象，不叫学问。

牛江河：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得到您提到的做学问需要的、而不是其他需要的现象。

冯胜利：做学问嘛，感觉很重要。其实有没有科学研究的素质或能力，是看你对你研究的现象敏感不敏感。这第一步就要看你有没有感觉(sense)，你的敏感度怎么样。

牛江河：我特别认同您的这个观点。对研究现象的敏感程度决定着您有多大的可能找到一个有意思的、正确的出发点。除此之外，如您前面所说的，还得看你的逻辑能力有多强。

冯胜利：这么多年来，西方的东西在我看来，最根本的就是科学逻辑。而逻辑就是演绎，不是归纳。这并不是每一个西方学者都能做得到的。然而，前沿学者、一流学者，没有不通逻辑的。要学一流的东西，学一流学者里的一流东西，这是很要紧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从一个学者的逻辑训练、推理能力上，就可以看出这个学者有多高的学术层次。

牛江河：您能评价一下中国的学者和西方的学者吗？

冯胜利：中国学者，像陈寅恪那样的，逻辑训练是非常强的，是一流的。逻辑不强的学者，不能算一流。中国学者，若谈中国学问，不通小学训诂的，在我看来，都是不到位的。我说的是国学。如果国学功底不够的话，我觉得这个学者无论怎样受时代欢迎、怎么深刻，在中国传统学术上仍然需要补课，因为他对国学了解得不够。一个民族想延续的话，没有语言文字，他可以改名换姓了。

牛江河：那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呢？

冯胜利：在很多情况下，你不能说中国没有把印度的佛教传下来吧？中国不但传下来了，而且还发展成禅宗了。难道中国人就成了印度人了吗？接受思想、传播思想固然是民族继承、沿袭的一个重要特征，但不是唯一的。别的国家的人也可以继承、传播你的思想和你的哲学，可能比你传承得还好呢！但是，他仍然不是你。唯独语言文字才让你成为你，而不是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死去的希伯来语今天又复活的原因。因此我说，真正的国学是中华民族的“根学”。离开这个国学，起码说明你在学术上深度不够。深度不够的一个结果就是理解中国的“根”不够。我们的玄奘也能消化佛教，把它带到中国，但玄奘不是印度人。他将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也没有因此而变成印度人。中国人当中可能有人佛教学得比印度人还好，但再好也不是印度人。对不对？印度人也并没有因为“丢”了自己的思想，或者被别人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他们就不是印度人了。

牛江河：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印度语言。

冯胜利：为什么章太炎要传播小学的道理也在这儿。对洋人来讲，只有通小学，才能真正通中国。不通小学，很难真通中国。不说洋人，就是中国人自己也一样。中国人不是个个都通国学，外国人也不是个个都通逻辑。我有两个标准：第一，用小学来衡量，看到底通不通国学，通到多深的程度；第二，用逻辑来衡量，看到底通不通洋学，通到多深的程度。所谓中西学术的通塞，或许就在于斯。

牛江河：我想有的学者会对您的这种标准产生质疑：从一个方面讲，小学能代表中国吗？如果不懂小学，但精通现代中文、当代中国文史哲、艺术、政治、经济、科技、教育、风土人情等，算不算通中国？反过来说，研究甲骨文的专家是不是也有理由认为精通甲骨文与否是衡量精通中国与否的标准呢？

冯胜利：我说的是绝对了一些。然而，我针对的是研究国学和西学的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无论如何，不通小学却说精通国学、不通逻辑却说精通西学者，都名不副实。谈一般的思想文化可以，谈民族的灵魂血脉则嫌肤浅。当然，我所谓的小学不只是文字学或甲骨学，小学的根本在训诂，它关涉深化到血液经络中的语义观念及其传承发展，这绝非甲骨字形所能涵括。

牛江河：不在语言、文学学术研究圈内的人或许会问：您研究的这些都有什么用呢？

冯胜利：《孟子》说：“君子何必言利？”我说：“学者何必言用？”非要说出一点什么来的话，那只能说太微薄了，没有什么大作用。然而，就东西学术的通塞而言，它们早晚会成为中国文化必需的东西。我强调“小学+逻辑”，就是想让中华民族人种的血液里面融入逻辑的DNA。除了学科建设之外，如果我有机会，我会用我最大的力量来宣传、促进这一点。中国学术的传统血液里面一定要激活逻辑这一基因。这个基因有了，中国的学术就……

牛江河：强大了！

冯胜利：对！现在中国的国力强大了，但是如果如果没有强大的学术，也不外乎是个暴发户。

牛江河：很高兴听冯教授谈您对中西学术彼此通塞的看法，希望以后有机会多多交流。

冯胜利：谢谢你的安排！以后有机会再详谈。

教育与学术之痛

受访人——丘成桐 (Shing-Tung Yau)

采访人——王洋

协调人——胡必亮



丘成桐教授